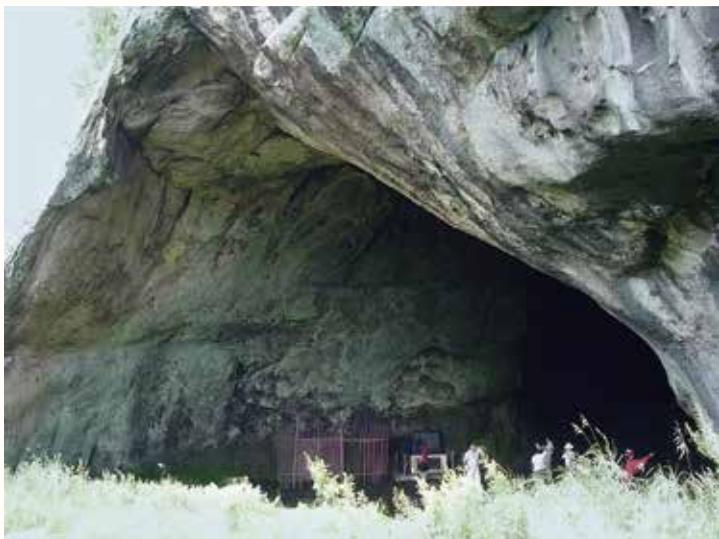


北魏 平城時代

李憑

著



孕育拓拔文明的搖籃嘎仙洞

2001年8月2日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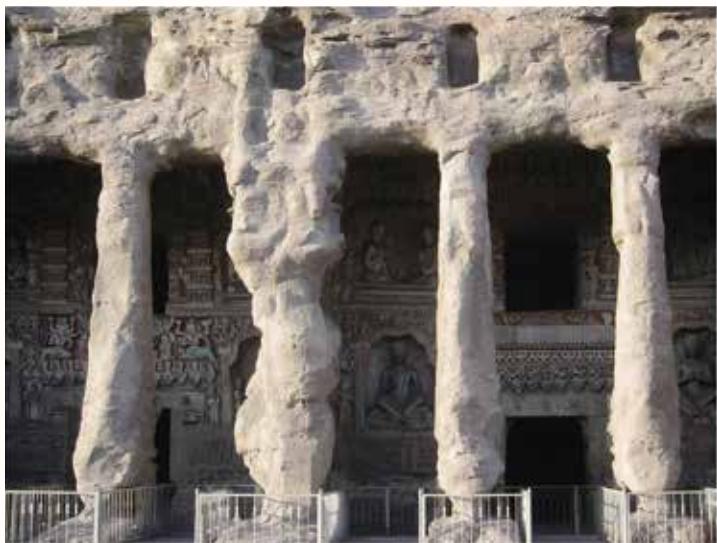
作者站在嘎仙洞內的北魏石刻旁

2001年8月2日 金裕哲攝



內蒙武川縣境通往漠北的白道

2006年2月9日攝



經歷千年風化的雲岡石窟

第九窟與第十窟之間，2004年3月7日攝



雲岡石窟內景局部

2001年8月9日攝



位於大同城南的北魏明堂遺跡

2008年5月24日攝



恒山山口

2004年3月7日攝，此地曾是北魏國都通向河北平原直道的要隘



始建於北魏太和十五年的懸空寺

2004年3月7日攝



山西省渾源縣麻莊賣太后陵

2008年5月29日攝



位於河北張家口雞鳴山麓的常太后葬地

2003年8月28日攝



位於山西大同方山的北魏文明太后永固陵

2010年7月12日攝



大同方山南麓北魏陵區建築遺跡

2008年5月26日攝



雲岡石窟頂部工地出土「傳祚無窮」瓦當
2010年7月11日攝



大代萬歲拓件——北魏宮城文物
原件現藏大同市考古研究所，殷憲拓存



雲岡石窟頂部工地出土石雕殘件

2010年7月11日攝



庚寅年清明祭掃位於河南省偃師縣境的北魏孝文帝長陵

2010年4月5日 陳長琦攝

目 錄

內容提要	/ 001
序章 平城政權發展軌跡	/ 003
第一章 皇權初建	/ 019
第一節 道武帝早年經歷考	/ 021
一、罪徙蜀地	/ 021
二、再遷長安	/ 028
三、中原文化的影響	/ 034
第二節 離散諸部考	/ 038
一、盛樂息眾課農	/ 040
二、河北屯田	/ 047
三、繁峙更選屯衛	/ 052
四、離散諸部後的京畿	/ 055
第三節 皇權的確立與危機	/ 062
一、乙未、丙申兩詔書的意義	/ 062
二、禍起蕭牆	/ 068
附表一 登國年間部落戰爭表	/ 075
附表二 道武朝殺黜臣僚表	/ 077

第二章 太子監國 / 081

第一節 拓跋燾為太子考 / 083

- 一、拓跋燾稱謂乖戾析 / 083
- 二、立太平王燾為皇太子辨 / 088

第二節 太子燾監國考 / 092

- 一、太子監國權力超越常規 / 092
- 二、明元帝自相矛盾的言論 / 095
- 三、北魏歷史上首位太子 / 097
- 四、清河王政變中提出的問題 / 102
- 五、拓跋烈是道武帝的同母弟 / 106
- 六、道武帝末年的皇位之爭 / 111
- 七、崔浩窺破明元帝的心病 / 116
- 八、太子監國的實質 / 120

第三節 正平事變 / 121

- 一、正平事變的真相 / 122
- 二、太子監國的意義與弊端 / 130

第三章 乳母干政 / 139

第一節 道武帝殺劉夫人原因 / 141

- 一、始作俑者 / 141
- 二、「縛父請降」者考 / 143
- 三、卵翼之下 / 149
- 四、矯枉過正 / 157

第二節 子貴母死故事 / 158

- 一、後宮常制 / 158
- 二、終革其失 / 169

三、前後意義相反 / 172

第三節 乳母常氏權傾內外 / 173

一、常氏發跡 / 173

二、立馮氏為后 / 175

三、常氏勢力 / 183

第四章 太后聽政 / 191

第一節 孝文帝非私生辯 / 193

一、拓跋氏早育 / 195

二、「高祖不知所生」解 / 197

三、楊椿之語的意義 / 199

第二節 文明太后臨朝聽政 / 204

一、兩次臨朝聽政之間 / 204

二、馮氏勢力 / 213

第三節 太后聽政的背景 / 219

一、馮、常身世 / 219

二、政壇「小人」 / 226

三、恒代遺風 / 230

四、宮廷女官 / 239

五、文明太后的漢文化素養 / 243

第四節 政歸孝文帝 / 250

一、旁落的皇權 / 250

二、無法解脱的困惑 / 255

三、孝文帝遷都策中的感情因素 / 257

四、文明太后對孝文帝的影響 / 262

第五章 京畿概況 / 269

第一節 京畿發展的基礎 / 272

- 一、北魏以前雁北的狀況 / 272
- 二、道武帝時期的大移民 / 275
- 三、京畿的初步開發 / 282
- 四、京畿發展基礎的奠定 / 288

第二節 平城的輝煌時代 / 290

- 一、平城的行政建制 / 290
- 二、平城的基本建設 / 293
- 三、平城郭城的範圍 / 300
- 四、平城的發展歷程 / 319

第三節 畿內眾多的城邑 / 321

- 一、近郊三縣 / 321
- 二、東北一城 / 326
- 三、東部二城 / 328
- 四、東南三城 / 330
- 五、南部三城 / 337
- 六、西南三城 / 350
- 七、西部一城 / 355
- 八、畿內城邑的發展歷程 / 357

第四節 畿內外的交通 / 361

- 一、畿內的交通 / 361
- 二、定州大道 / 363
- 三、并州大道 / 366
- 四、北魏全境的交通中心 / 368

第六章 宗主督護 / 371

第一節 宗主督護考 / 372

第二節 社會背景 / 379

一、宗族強化 / 379

二、塢壁林立 / 383

第三節 犬牙政策 / 387

一、針對中原 / 387

二、蕩而更制 / 392

三、矛盾緩和 / 397

第四節 推行三長制 / 401

一、弊端漸顯 / 401

二、代以三長 / 407

末章 平城時代歷史意義 / 411

附錄 / 418

表一 北魏建國前拓跋部諸帝世系表 / 418

表二 北魏皇帝世系表 / 419

表三 北魏平城時代諸帝年號表 / 420

表四 北魏皇帝生卒及在位略表 / 422

表五 代國後期至魏國初期拓跋諸帝與異部族聯姻簡圖 / 424

再版後記 / 426

第三版後記 / 428

第四版後記 / 429

繁體版後記 / 432

內容提要

本書論述的是公元 398 年遊牧民族鮮卑拓跋部在今山西省大同市所建北魏平城政權的發展歷程。

以道武帝為首的一批曾在中原流亡的拓跋貴族，由於感受過中原傳統制度和文化的影響，積極地推行離散諸部措施，以剝奪部落酋帥的特權，促使拓跋部落聯盟迅速解體，建立起新型的平城政權。隨後，道武帝推行一系列仿效中原傳統制度的政治、經濟措施，特別是建立皇權和官僚系統，以取代部落聯盟首領的推舉制度，從而將拓跋部推進中原傳統體制的門檻。不過，拓跋部落的遺制仍然頑固地影響着平城政權，在皇位繼承中兄終弟及遺制的干擾就是突出的反映，而且由此引發了道武帝末年的動亂。

平息動亂以後即位的明元帝，採納漢族士人崔浩的建議，以太子監國制消除兄終弟及制的影響，確立了父子相承的皇位繼承制，使其長子太武帝順利地繼承皇位。太武帝即位後繼續實行太子監國制，但結果卻使太子集團膨脹為與皇權對抗的勢力，釀成正平事變。事變的結果，皇權與太子勢力兩敗俱傷，母后勢力乘機抬頭。

由於建立平城政權之前拓跋部尚處於脫離母系氏族社會不久的父系家長制時代，母權制在拓跋部的社會中具有深刻的影響，道武帝為了預防母后干預政治，建立起矯枉過正的子貴母死制度。然而，由子貴母死派生出來保母撫養太子的慣例，進而發展成為保母干預政治的現象。

太武帝保母竇氏、文成帝乳母常氏都曾干預朝政。乳母常氏的干政最終導致文明太后的臨朝聽政，出現了與道武帝建立子貴母死制度的初衷恰恰相反的結果。

文明太后臨朝聽政是母后權力的特大伸張。不過，它的產生雖然

與母權制遺俗相關，卻並不意味歷史的倒退。此時的拓跋社會脫離部落聯盟而在中原傳統軌道上運行已近八十年，所以當文明太后凌駕於皇權之上時，她自己就成了中原傳統體制的象徵，而非母系氏族時代部落聯盟的代表。而且，文明太后推行的太和改制運動使得平城政權基本實現中原傳統體制化過程，並為其全面漢化奠定了基礎。但是，在父子相承已經成為傳統制度的社會裏，雖然文明太后可以使她的政治權力膨脹到超越帝王的地步，卻無法將這種母后至高的權力像皇權那樣自然地傳承下去。公元 490 年文明太后去世，意味太后臨朝聽政時期結束，標誌拓跋皇權重新伸張，但北魏平城時代還延續了四年。直到公元 494 年，孝文帝為開拓新的政治局面，將國都遷到洛陽，才使得平城時代終結。

北魏政權的演變利用了平城這個政治舞台，平城則借助於北魏政權演變的契機獲得躍進式的發展。處於那個時代最突出地位的平城，從介於農耕區與草原區的邊陲軍鎮，一變而成為新興王朝的京師。當長安和洛陽兩大文明古都屢遭戰馬鐵蹄踐踏而成為廢墟之際，平城卻迅速聚集百萬人口，形成為北方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和交通樞紐。在此基礎上，平城政權在中原推行宗主督護制以羈縻漢族地主豪強，創造了內和外輯的安定局面。

在北魏平城政權的發展過程中，既曾頻繁地與周邊的政權和部族發生戰爭衝突，也曾積極地推行和平交往。因此，從東北的大興安嶺到西南的巴蜀，從西北的貝加爾湖到東南的江淮，各族政權絡繹不絕地朝貢拓跋王朝，各族人民紛至沓來地會合平城京畿。傳統的農耕文明經強勁的遊牧文明之新鮮活力所滲透，掀起了洶湧澎湃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運動，豐富了中華民族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中華文明隨着安定統一局面的逐步形成而得到整體的昇華。北魏在平城經營的一個世紀，是拓跋歷史上最輝煌的階段，也是中國歷史上輝煌的時代之一。

序 章

平城政權發展軌跡



鮮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天興元年（398 年）至太和十八年（494 年）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裏是以平城為其統治中心的，我們不妨稱之為北魏平城政權，並將與之相應的時代稱為北魏平城時代。制約北魏平城政權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它的發展過程異常錯綜復雜。雖然如此，在其中仍然能夠發現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那就是北魏皇權的建立與發展過程。由於拓跋部落遺制的不斷干擾，北魏皇權的發展呈現為時起時伏的狀態。而這種狀態又牽動着整個平城政權，使它的發展歷程呈現為迂迴曲折的運動軌跡。

北魏平城政權的前身是代國。不過，代國與十六國時期各遊牧部落在中原建立的政權並不相同，與其說是國家，毋寧說是在國家機器面前徘徊的部落聯盟。^①自魏晉以來，這個以拓跋部落為核心的部落聯盟一直活動在以黃河河套為中心的陰山山脈以南大草原上。當其勢力強盛時，便多次沿黃河東進到大同盆地，甚至南下到晉中一帶。

在末代代王什翼犍建國三十九年（376 年）之際，前秦天王苻堅派遣大司馬苻洛率領二十萬大軍北上，擊敗代國部眾。然後，前秦將什翼犍所轄各部割裂開來，一部分歸屬於曾經被拓跋部戰敗的鐵弗部首領劉衛辰，另一部分歸屬於原先敗歸拓跋部的獨孤部首領劉庫仁，從而滅亡了代國。此後十年之間，拓跋部落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②

① 詳見唐長孺先生《拓跋國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收於《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北京，1955 年第 1 版，第 193—249 頁。李亞農先生也在《周族的氏族制與拓跋族的前封建制》後編第九章《轉型期的婚姻制度》中指出，拓跋部此際處於「由母系而父系的轉型期」，收於《李亞農史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62 年第 1 版，第 339—345 頁。

② 本段內容詳見《魏書》卷一《序紀》、卷二《太祖紀》、卷二三《劉庫仁傳》、卷二四《燕鳳傳》、卷九五《鐵弗劉虎附劉衛辰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北京，1974 年第 1 版。本書中引用的《魏書》、《北史》、《晉書》以及《資治通鑑》等傳統文獻均以中華書局陸續出版的標點本為依據。其中：文字，全同於中華本；標點符號，大多同於中華本，個別之處按照作者自己的理解處理。對於與中華本標點不同之處，其影響論證者，已經伴隨相應的內容加以說明；不影響論證者，則逕予改動而不加贅注。

登國元年（386 年）正月，什翼犍之孫拓跋珪糾集拓跋各部在牛川^①重建代國，自己即代王位。^②新的政權建立以後，拓跋部面臨兩種截然不同的前途：要麼，像其祖輩那樣，繼續以部落聯盟的形式馳騁在北方大草原上；要麼，像在其之前進入中原的其他遊牧部落那樣，仿效中原地區的典章制度，建立起中原傳統體制的國家。曾經長期流落中原而深受漢文化熏陶的拓跋珪以及追隨他的一批代國王室成員和貴族選擇了後者，並因此與力圖保持草原遊牧部落生產方式和生活狀態的部落貴族勢力發生激烈的鬥爭，鬥爭的主要形式表現為登國年間持續十多年的部落戰爭。

伴隨對於草原各部落征服戰爭的推進，拓跋珪實行了有利於部落聯盟解體和新型政權創建的離散諸部措施。離散諸部措施並非孤立的法令，而是屬於包括「分土」、「定居」、「使役」等措施在內的一套綜合性法令中的一項具體的措施；並且，它還是與拓跋珪推行的一系列農墾政策相配合地實施的。拓跋珪施行離散諸部措施的目的，是要剝奪那些陸續地歸附和被征服的部落酋帥們對其部落的統領權力，進而將這些部落的部民連同其酋帥在內統統轉變為拓跋政權統治下的「編民」，並促使他們去從事農耕。但是，這樣做不僅直接損害了部落酋帥們的經濟、政治利益，而且違背了草原遊牧部落的舊俗，因而招

① 牛川，譚其驥先生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武川御夷諸鎮圖中標作今內蒙古自治區境內的錫拉木林河，中華地圖學社，上海，1975 年第 1 版，第 46 頁。王仲犖先生在《北周地理志》附錄一《北魏延昌地形志北邊州鎮考證》撫冥鎮條下注為「今內蒙四王子旗（按：應是四子王旗）西北之錫拉木倫河」，中華書局，北京，1980 年第 1 版，第 1096 頁。日本學者前田正名先生則認為，牛川應是《水經注》中所載的芒干水（今內蒙古自治區境內的大黑河）的上游，或為其上游的一條支流，見於《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第四章第二節第二小節，該書中譯本由李憑、孫耀、孫蕾合譯，書目文獻出版社於 1994 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2012 年列入《日本中國史研究譯叢》而再版，第 120 頁。筆者同意前田正名先生的看法。

② 詳見《魏書》卷二《太祖紀》登國元年條。當年四月拓跋珪改稱魏王。

致他們的反覆抗拒。由於諸多部落的激烈抗拒，加上西燕、後燕等外部勢力的入侵，迫使離散諸部措施兩度中斷。因此，與部落戰爭相伴隨，離散諸部措施也斷斷續續推行十來年的時間才大體完成。

首次離散諸部的時間是登國元年，地點在盛樂。^①它是與「息眾課農」政策相配合實施的。但是，當年八月，由於乙弗等部的反抗和西燕支持下的窟咄勢力的進犯，拓跋珪不得不率部落逃往陰山以北，這次離散諸部措施便流產了。第二次離散諸部是與登國九年（394年）由衛王拓跋儀主持進行的屯田相配合而實施的。這次離散諸部雖然只是在五原^②地區的部落中施行，但其意義並不亞於第一次，它是拓跋部落聯盟大規模地分化成為從事農業與繼續遊牧的兩大部分的標誌。與此相應，拓跋部的軍隊也增加了一項新的監督農業生產者的職能。不過，第二次離散諸部又因第二年後燕太子慕容寶率軍進犯而中止。直到天興元年，拓跋珪抓住其統領下的各部落集中於大同盆地內的大好時機，憑藉剛剛取得的敗亡後燕的勝利之威，才達到全面實施離散諸部措施的目的。至於第三次離散諸部，實際上就是該年二月拓跋珪對各部落及從後燕舊地遷到大同盆地的新民進行農、牧分工和將軍隊劃分為從事征戰與監督農業生產的兩部分的所謂「更選屯衛」。

離散諸部以及與它相伴隨的「分土」、「定居」、「使役」等措施是拓跋珪推行的最有積極意義的改革。它促使北魏統治下的大部分遊牧部落的組織分解，加速這些部落的產業由遊牧向農耕、半農耕轉化，並推動各部落內部階級分化的進程。因此可以說，離散諸部等措施在拓跋部落聯盟解體以及向中原傳統體制國家轉化的過程中發揮着關鍵作用。

隨着部落戰爭和對外戰爭的節節勝利，隨着離散諸部等措施的逐步推行，拓跋珪的統治權力也日益發展。天興元年六月，拓跋珪詔有

^① 盛樂，縣治，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縣北。

^② 五原，郡治，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九原區境。

司議定國號為魏。七月，拓跋部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八月，拓跋珪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徑術，標道里，平五權，較五量，定五度。十一月，拓跋珪詔：尚書吏部郎中鄧淵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呂，協音樂；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饗宴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渾儀，考天象；吏部尚書崔玄伯總而裁之。從而，新政權仿效中原傳統制度，初步建立起國家機器及相應的典章制度，特別是以皇權和初創的官僚系統取代了部落聯盟首領的推舉制。同年十二月，拓跋珪稱皇帝，改元天興，是為北魏道武皇帝。^①

新型的平城政權建立以後，北魏對北方大草原上的遊牧部落繼續實行大規模的征伐，迫使那些部落內徙或依附。與此同時，道武帝還對新佔領的中原地區的反抗勢力進行鎮壓或將其遷徙。在對北方草原遊牧部落和中原反抗勢力的征伐戰爭取得全面勝利的背景下，道武帝於天興三年（400年）十二月乙未和丙申連續頒佈了兩道詔書。在這兩道詔書中道武帝反覆強調，北魏皇權乃「天人俱協」，「大運所鍾」，是「不可以非望求」的；而臣下的職權是皇帝賜予的，因此「用之則重，捨之則輕」。^②其中心思想無疑是要建立專制的統治。結合上述道武帝任用崔玄伯、鄧淵、董謐、晁崇等漢族士人制定一系列仿效中原傳統典章的統治制度來看，乙未、丙申兩詔書的頒佈可以看作將平城政權納入中原傳統體制軌道的標誌，它表明拓跋部的統治機器在北魏建國之初就從部落聯盟轉化成了集權性質的國家。在後來平城政權的發展過程中，這部新型的統治機器便越來越強化，最終完全佔據了政壇的主導地位。

乙未、丙申兩道詔書既是實行集權統治的宣言，又是開始鎮壓拓

^① 詳見《魏書》卷二《太祖紀》天興元年條。

^② 詳見《魏書》卷二《太祖紀》天興三年十二月條下的乙未、丙申兩詔書。

跋部內反抗皇權勢力的信號。《魏書》卷二《太祖紀》在記錄丙申詔書之前稱，該詔書是由於「慮群下疑惑，心謗腹非」而發佈的。此言雖不全面，但道出了北魏朝廷內部的激烈矛盾。《太祖紀》還在天賜六年（409年）條下稱，道武帝末年因濫殺、濫黜臣僚致使「朝野人情各懷危懼」。其實，道武帝的殘暴統治並非僅限於其末年，而是從乙未、丙申兩詔書頒佈之時就開始了。許多臣僚被殺戮或降黜雖因道武帝的「喜怒乖常」所致，但其中也有不少人的確有反對新的集權統治之心。從部落聯盟轉化為集權政權，從遊牧轉向農耕，對於一向馳騁於大草原的拓跋所統各部來說是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變化既動搖了拓跋社會傳統習俗的根基，又觸犯了部落貴族現實的經濟利益。天興三年以後，雖然大部分部落已經臣服於北魏王朝，但是部落貴族並不甘心失去既往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他們一有機會就進行反叛。因此，長期的部落戰爭雖然暫時停頓，卻轉化成了各種形式的反抗與鎮壓。而朝廷內外的許多貴族又往往與那些反抗勢力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應該看到，道武帝殘忍地殺戮和降黜臣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鞏固他的集權統治。但是結果卻適得其反，誠如《太祖紀》中所言，搞得「朝野人情各懷危懼」，社會動盪不安。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道武帝未能採取積極有效的安定局面的措施，卻又急於要解決皇位繼承問題。而在皇位繼承問題上，道武帝的原則又與拓跋社會的傳統習俗相違背。在平城政權建立之前，草原上舊的部落聯盟大酋長在形式上是由各主要部落推舉產生的；在尚處於脫離母權制不久的父家長制社會階段的拓跋部內，部落首領的繼承則實行兄終弟及制。但是，道武帝卻想按照中原漢族社會的制度，實行父子相承的皇位繼承制。同時，道武帝還制定了子貴母死制度，企圖徹底杜絕拓跋部政治生活中長期存在的母權干預政治的現象。道武帝這種矯枉過正的做法終於釀成一場父與子、兄與弟之間自相殘殺的政變。

天賜六年，道武帝決定立長子拓跋嗣為皇儲，於是賜拓跋嗣之母劉貴人死，並告訴拓跋嗣，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不令婦人後與國政，使外家為亂」。拓跋嗣對道武帝的做法難以理解，被迫出走。^①道武帝不得已，就打算改立次子清河王拓跋紹為皇儲，因此又欲重演殺妃故伎，決定殺死清河王紹母賀夫人。賀夫人遂與清河王紹密謀，發動政變，反將道武帝殺死。^②清河王政變的導火索雖然是皇位繼承問題，但實質是平城政權危機的總爆發。不過，道武帝雖然死於政變之中，但他創建的封建集權統治的根基卻未動搖。道武帝的長子拓跋嗣在平息清河王政變之後接替皇位，是為明元帝。道武帝建立的北魏皇權在明元帝身上得到延續。

明元帝時期建立了一項值得注意的政治制度，那就是太子監國。以太子監國並非北魏特有的現象，中原王朝中早就有過先例，不過大多屬於權宜之計。但是，北魏明元、太武兩朝卻將太子監國作為皇權的輔助方式，使之成為固定的制度，這是北魏平城時代政治的特色之一。明元帝建立太子監國制的原因在他的兩次談話中說得很明白：在建立此制前，他對漢族大臣崔浩說，因為自己疾病彌年，療治無效，所以想在生前就將政權交付給太子；在建立此制後，他對左右侍臣說，讓太子代為行使行政權力，可以使自己騰出身來去鎮壓國內的反抗和征伐異國。^③但是，實際上明元帝心中還隱藏着一個不便道明的目的，那就是像他的父親道武帝一樣，想將皇位順利地傳給長子拓跋

① 詳見《魏書》卷三《太宗紀》。

② 詳見《魏書》卷一六《道武七王·清河王紹傳》。在《清河王紹傳》中，作者對於拓跋紹竭力貶斥，但也不免流露出諸多破綻，這在本書第二章第二節之六中將要論及。《魏書》貶斥拓跋紹的原因，簡言之乃魏收袒護後來成為明元帝的拓跋嗣所致。又，該傳稱「紹母賀夫人有譴，太祖幽之於宮，將殺之」，似乎道武帝將殺賀夫人與立皇儲事無關。其實不然，按照筆者的理解，道武帝要殺賀夫人仍然是執行「子貴母死」制度，目的是為了立清河王紹為皇儲。

③ 詳見《魏書》卷三五《崔浩傳》。

燾，而不願意遵循拓跋部落的舊俗兄終弟及制。

兄終弟及制在拓跋部政治生活中影響時間很長，道武帝有意廢除之，未果而亡。明元帝雖然以長子的身份登上皇位，但他的皇位是從弟弟清河王紹手中奪得的。而清河王紹則是發動政變殺死道武帝後獲得皇位的。像這樣，通過政變而獲得皇位的方式，並不能表明兄終弟及制被徹底廢除，更不能表明父子相承已經成為制度。

清河王政變事在《魏書》卷一六《道武七王·清河王紹傳》和《資治通鑑》卷一一五《晉紀》義熙五年（409年）條中均有記載，但文字略有差異。前者載，清河王紹殺道武帝後曾問群臣道，「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後者也載有類似的問話，只是「父」字之上多了一個「叔」字。但從清河王紹說話時道武帝已經被殺的情況來看，似依《資治通鑑》作「叔父」較為合理。而且道武帝雖無同母同父弟，卻有同母異父弟。參證《魏書》卷一五《昭成子孫列傳》的記載可知，他們是衛王儀、秦王觚和陰平公烈。當清河王紹政變之時，陰平公烈尚在世，他實際上就是清河王紹語中所說的「叔父」。這樣，《資治通鑑》的記載得到證實。它表明，當時兄終弟及遺制不僅沒有明確廢止，而且還具有很大的影響，否則清河王紹便無須向大臣們發出「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的問話。

明元帝末年，在世的皇弟尚有廣平王拓跋連和京兆王拓跋黎，他們雖然年齡尚幼，但均較太子拓跋燾年長，因此皇位之爭的隱患仍然潛在。為了防止身後發生骨肉之爭，明元帝採納崔浩的建議，建立起太子制度，並且以太子為監國，在其生前就將最高統治權授予太子燾。使太子燾的皇位繼承權成為既定事實，這正是明元帝藏於心目中的以太子為監國的真正目的。

以太子監國的辦法除卻兄終弟及遺制的影響，實在是一大發明。從此之後，中原王朝例行的父子相承的繼承制成為北魏皇位傳遞的傳統。

明元帝去世後，太子拓跋燾順利繼承皇位，是為太武帝。太武帝仿效明元帝，也以其太子拓跋晃監國。不過，在太子拓跋晃監國之際，太武帝正值年富力強之時，所以拓跋晃監國時間持續了十三年之久。時間一久，太子監國的弊端便逐漸暴露出來。皇帝與太子在軍事和行政上的分工，實質上是皇權職能的分化，這種分化的本身就意味著對於集權於一身的專制統治的否定，因此必然導致皇權運行的危機。事實上，當太子晃的權力膨脹到一定程度時，東宮集團便形成了；當東宮集團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它與皇權之間的鬥爭便不可避免了；當二者之間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的程度時，政治危機就爆發了。於是，正平元年（451年）事變發生，結果太子與皇帝相繼被殺。

皇帝與東宮集團的同歸於盡，標誌太子監國制的終結。接着，閹官宗愛篡權，北魏政局處於動盪之中。在這種狀況下，皇權難以伸張，后權卻在政治權力鬥爭的夾縫中乘機而興了。

北魏後宮有賜儲君生母死的制度，史家稱之為子貴母死故事，首例是道武帝殺明元帝母劉夫人。據《魏書》卷三《太宗紀》載，道武帝出此殘忍之策的目的是「不令婦人後與國政，使外家為亂」。道武帝為何如此深忌「婦人後與國政」呢？這與他早年的經歷密切相關。

道武帝在代國滅亡以後的經歷，《太祖紀》記載極略。同書卷二四《燕鳳傳》中，在燕鳳與前秦天王苻堅討論代北事務的處置問題時提到了道武帝，但這段史料在時間和地點上都存在紕漏，因而相關的內容與《太祖紀》矛盾。其原因，正如周一良先生在《關於崔浩國史之獄》一文^①中指出的那樣，由於崔浩國史之獄的緣故，史臣不敢直書北魏史事，致使北魏早期的歷史疑竇叢生。周先生還指出，對於代國滅亡前後的歷史，《晉書》和南朝史籍所載反較《魏書》正確。如

^① 刊於《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第4期，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又收於《魏晉南北朝史札記·〈魏書〉札記》中，其題目去掉了「關於」二字，中華書局，北京，1985年第1版，第342—350頁。

將《燕鳳傳》與《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上》、《宋書》卷九五《索虜傳》和《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等記載相對照，不僅其時間與地點上的紕漏可以化解，而且還可以互相印證地勾勒出道武帝早年的經歷。這段經歷是：道武帝先與其祖父代王什翼犍等一起被俘虜到長安，然後他又從長安流徙到蜀地；直到什翼健死後，道武帝才被遷回長安；淝水之戰後，道武帝隨從慕容垂來到中山；最後，道武帝被慕容垂送回代北。

從代國滅亡到北魏建國的這段時間裏，道武帝的年齡在六歲至十五歲之間。由於年齡幼小，他始終處於母親賀氏的監護下。從上段所引史料出發，參證《魏書》卷一三《皇后·獻明皇后賀氏傳》和同書卷八三上《外戚上·賀訥傳》等記載，可以了解到道武帝受監護的這段生活中值得記述的五件事情：其一，賀氏以道武帝的名義綁縛昭成帝投降前秦，致令道武帝與她一起被流徙蜀地；其二，道武帝在賀氏的卵翼下客居蜀、長安、中山等地；其三，回到代北後，道武帝在賀氏的保護下擺脫了分治大草原的獨孤部和賀蘭部的控制與逼迫；其四，道武帝在賀氏及其兄賀訥的扶持下登上代王位；其五，在建設北魏政權中賀氏發揮了重要的影響。這五件事說明賀氏不僅在生活上監護過道武帝，而且對道武帝的政治前途起過關鍵性的作用。因此，道武帝登上王位以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舊受制於賀氏。這種狀況延續至皇始元年（396年）賀氏去世為止。由於這些經歷，使道武帝對於母后干預政治的現象具有十分深刻的體驗和認識。為了使其身後不再發生類似的情況，道武帝決計殺死明元帝的生母劉貴人，從而立下殘忍的子貴母死制度。

北魏以及代國的歷史上，在政治方面有所作為的婦女不乏其人，這與拓跋部離開母系氏族社會為時不久因而社會尊崇母權密切相關。母權制遺俗既然在北魏社會影響深刻，那就絕非以簡單的殺戮辦法所能根除，它還會通過特別的途徑和採用特別的方式頑強地表現出來。

由於喪母的儲君往往幼小，需要有人撫養，因此由子貴母死制度便自然地派生出了以保母撫養儲君的慣例。而後，保母撫養儲君的慣例在母權制遺俗極濃厚的拓跋社會中又發展成為保母干預政治的怪誕現象。第一位干預政治的就是明元帝的太子拓跋燾即太武帝的保母竇氏。接着，又出現了太武帝之孫、太子拓跋晃之子文成帝拓跋濬的乳母常氏。常氏在正平元年事變中保護過文成帝，所以文成帝即位後她的地位和權力便上升至等同於嫡親的太后。常氏甚至在後宮之中掌有生殺大權，她為了壓制文成帝而引用子貴母死故事殺死文成帝的寵妃李氏，然後將自己選中的馮氏扶上皇后的寶座。這位馮氏就是後來的文明太后。不但如此，常氏還將其政治觸角伸向外朝，原先地位並不高的乙渾、林金閻等人能夠成為政治上的暴發戶就與常氏的培植密切相關。

就是這樣，尊崇母權的遺俗通過保母干預政治的方式又頑固而曲折地表現出來。乳母常氏的干預政治最終發展成為文明太后的臨朝聽政。從歷史的脈絡來看，文明太后的臨朝聽政恰恰是由子貴母死制度經保母撫養儲君的慣例引發的，這與道武帝建立此種制度的初衷截然相反，是道武帝始料未及的。

文明太后是在天安元年（466年）平息乙渾之亂後第一次臨朝聽政的，但為時不久她就罷令了。從《魏書》卷一三《皇后·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傳》的記載來看，文明太后的罷令似乎與撫養孝文帝一事有關。其實文明太后是迫於獻文帝的壓力而不得不罷令的。文明太后罷令後，她與獻文帝之間的矛盾不僅沒有緩和，反而更加激化。他們之間的鬥爭以獻文帝被文明太后害死而告終。決定二者高下的轉折點是獻文帝的禪位事件，而決定文明太后最終勝利的因素則是年幼的孝文帝。通過撫養的方式被文明太后牢牢控制在手的孝文帝成了文明太后奪取勝利的一張王牌，正是這張王牌使得文明太后在承明元年（476年）實現再次臨朝聽政的願望。文明太后在被迫罷令後竟以太

后之尊去撫養並非自己親生骨肉的孝文帝，這實在是一招高明的政治手段。而這一手段的產生其實得自於文明太后在宮中所見到的乳母常氏干預政治的歷史經驗。它使文明太后認識到，只要控制住儲君，就會有攫取最高統治權力的機會。

文明太后的勝利使她成為封建專制集權的最高統治者。然而，文明太后也因此陷入自身無法解決的困惑之中。因為，在父子相承已經成為傳統的封建社會裏，雖然文明太后可以使她的政治權力膨脹到超越帝王的地步，但是卻無法將這種母后至高的權力像皇權那樣自然地傳承下去。文明太后最終不得不承認現實，仍然保留了在自己卵翼之下的孝文帝的皇位。

天興元年進入平城的拓跋部雖然一開始就建立起集權統治，踏上封建化的道路，但是部落遺制和遺俗仍然不斷地影響和制約其發展。消化部落遺制的作用和排除部落遺俗的影響並非短期的暴力舉動或者矯枉過正的措施所能奏效，而且集權機制也需要逐步地完善，因此北魏王朝的改革與發展必然是一個艱巨、曲折的過程。於是，就使得拓跋政權在平城停留了將近一個世紀，形成為歷史上的北魏平城時代。對於脫離原始社會和遊牧狀況不久就立即面對早已進入封建時代的漢族社會與漢族文化的拓跋部來說，這個漫長的過程是必要的。

拓跋社會的部落遺制和遺俗表現在諸多方面，本書只是重點考察其中制約北魏皇權的主要的因素，那就是部落聯盟首領的推舉制、兄終弟及的繼承制和尊崇母權的遺俗。由於這些遺制和遺俗的制約與隨而引起的反制約之間的相互作用，致使北魏皇權經歷了艱難的創立時期和特殊的太子監國、太后臨朝聽政形態。因為皇權高踞於整個國家機器和社會的至高點，其運行過程正是國家機器乃至社會發展的主線，所以，通過對北魏皇權的考察，就可以比較清晰地勾勒出拓跋部平城政權的發展軌跡。本書前四章的內容正是按照這條軌跡展開的。

本書第五章以北魏平城時代京畿的發展狀況為論述的對象。平

城時代的京畿包括自然地理上的大同盆地以及盆地周圍的山區。處在京畿中心的平城，經過大約十五個世紀的發展，演變成如今的大同城區。而平城以外的畿內，則演變成如今山西省的大同和朔州二市所轄區域，還曾一度合稱為雁北地區。這片區域，歷史上最榮光輝煌的階段，正是北魏平城時代。

平城原來只是介於農耕區與草原區的邊陲軍鎮，立為北魏京師之後一變而成為新興的移民都市。北魏將眾多新佔領地區的人民陸續地強行遷徙到京畿。僅開國皇帝道武帝統治時期，遷入京畿的人口就有約一百五十萬，其中成為平城都市的新居民者估計為一百萬左右。在這一股接一股的遷徙人流之中，既有來自當時經濟發展較先進的河北平原上的漢族人民，也有社會發展階段比拓跋部還要後進的高車等遊牧部族；既有自耕農、農奴、奴隸與氏族成員，也有地主、豪強、官吏、士大夫、奴隸主貴族和部落酋帥，還有百工伎巧和商人。

對於移民，北魏政權採取因人而異的辦法，使他們在基本上不改變原有生活方式的情況下，能夠盡快地適應新的自然環境和生產條件。人口的驟增與妥善的安排有利於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又促使人口迅速地繁衍。通過移民與原住民的共同辛勤勞作，京畿的農業、牧業很快興旺起來，進而推動了都市建設和交通貿易的發展。

定都平城之後，北魏隨即着手進行都市的建設。規劃都市的藍本，是中原的傳統都市鄴城、洛陽和長安；建築都市的物資，是從全國各地調集來的，僅木材就有數百萬根；參與建設的工匠，大多是來自中原的百工伎巧及其後代。平城市區的面積寬闊，佈局規整；郊區更是廣袤無垠，遍佈苑圃與石窟。平城大規模的都市建設，又帶動了圍繞其周邊的眾多畿內城邑的發展。

畿內城邑的規劃與建設，也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中原城邑形制的影響。這些城邑的分佈狀態是頗具特色的。它們毫無例外地建立於聯繫平城與其他地區的交通幹線側近。從地圖上看，其佈局恰似一把面

向東南方向展開的巨大摺扇。平城位於扇柄，畿內城邑分佈於各條扇骨。這樣的佈局十分有利於京師與各地重鎮尤其是中原都會的政治與經濟的聯繫。反過來，與中原地區政治與經濟聯繫的加強，又推動着平城與畿內城邑的發展。

在長安和洛陽兩大文明古都屢遭戰馬鐵蹄踐踏而成廢墟之後，平城迅速崛起，凝聚百萬人口，形成為繁榮的都市和全國交通的樞紐。以平城為中心的交通線路，能夠暢達地東出幽燕，西抵關隴，南下洛陽，北上大漠，可謂四通八達。在這些交通線路中，最著名的是并州大道和定州大道，它們不僅是輸送商貿物資的通衢，而且是北魏貫徹政令的命脈。

平城時代的北魏王朝，雖然是封建集權的政權，但是它的集權範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局限於京畿。對於陸續佔領的廣大中原地區，平城政權從明元帝永興五年（413年）起推行宗主督護制，通過地方勢力的代表宗主豪強去間接地統治那裏的人民。雖然由於太武帝的東征西伐使得北方的大部分地區向北魏王朝俯首稱臣，但是平城政權真正將統治的觸角伸達中原的基層則在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以三長制取代宗主督護制以後。換而言之，是在推行三長制之後，北魏王朝才成為整個北方地區真正意義上的集權統治政權。不過，這也意味着地處偏僻的平城政權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本書第六章便論述了從宗主督護制到三長制的變化。

依據平城政權的發展軌跡，歸納其間的種種跡象，可以將平城時代劃分為前、中、後、末四個時期。

前期始於天興元年七月道武帝建都平城，終於泰常七年（422年）四月明元帝以太子燾監國之前，計二十四年。這是北魏皇權的創建與鞏固時期，除了確立封建集權統治外，集中人力去開發與建設大同盆地，造就以京畿為根據地的拓跋政權，是這個時期北魏王朝的主要成就。不過，北魏王朝的直接統治範圍也因此被局限於平城及其附近地

區。在平城時代前期，北魏實質上是與十六國後期諸王朝並列的割據政權。

中期始於泰常七年五月明元帝以太子燾監國，終於正平二年（452年）三月太武帝被閹官宗愛謀殺，計三十年。這個時期最大的事件是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滅北涼而一統北方版圖，不僅結束了一百三十餘年十六國分裂局面，而且為北魏王朝政治與經濟的發展開拓出廣闊的天地。這個時期政治上最顯著的特點是明元、太武兩朝的太子監國。當然，應該注意的是，雖然太子監國是這一時期的特點，但是皇權並未降到次要地位。培植太子勢力，防範宗親利用兄終弟及遺制奪權，以確保皇權按照父子相承地傳遞，正是這個時期皇權運行的重要內容。

後期始於正平二年三月閹官宗愛擅權擁立南安王拓跋余為主，終於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文明太后去世，計三十八年。這個時期雖然經歷了文成、獻文、孝文三代皇帝，但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卻是文明太后。需要指出的是，文明太后第一次臨朝聽政的天安元年（466年）二月上距正平二年三月有十四年之久，這期間的大部分時間由乳母常氏弄權，不過從整個歷史發展的進程看來也是文明太后臨朝聽政的準備階段。所以，我們還不妨以天安元年二月作為界限，將這一時期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特點是乳母干政，或者也可以稱作保姆干政。第二階段為時二十四年，特點是太后臨朝聽政。在文明太后的主持下平城政權推行了一系列沿着全面封建化即漢化的方向發展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的改革，從而將平城時代推向繁榮昌盛的高潮。

文明太后去世之後，北魏王朝仍舊在平城駐足四年，這是平城時代的末期。此時皇權雖然重新伸張，但是文明太后的陰魂未散，她遺下的勢力尚能制約政局。為了盡快改變局面，孝文帝於太和十八年（494年）十月將都城遷到洛陽。北魏平城時代宣告結束。

北魏在平城經營的時間將近一個世紀，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只是

短暫的一瞬，卻是鮮卑拓跋部歷史上最輝煌的階段，也是中國歷史上輝煌的時代之一。關於北魏平城時代的歷史意義，將在本書的末章略作評價。

第一 章

皇權初建



從天興元年（398 年）七月道武帝遷都平城起，到泰常七年（422 年）四月明元帝以太子拓跋燾監國之前為止，是拓跋皇權的初建與鞏固時期，為北魏平城時代的前期。而嚴格意義上講，道武帝建立平城政權的活動始於登國元年（386 年）正月他在牛川即代王位時，天興三年（400 年）十二月乙未、丙申兩詔書則是道武帝發佈的實行中原傳統體制的宣言，自此之後才是皇權的運行階段。

拓跋皇權的確立是在血腥的部落戰爭基礎上通過離散諸部等措施而打破舊的部落聯盟後實現的。拓跋皇權確立以後，道武帝繼續對外征伐異族部落，對內殘酷鎮壓反抗勢力，企圖以此鞏固其集權統治。但是，事與願違，道武帝的殘暴統治使得朝廷內外人心惶惶，終於引發了政治動亂。天賜六年（409 年），由於皇位繼承問題激起清河王政變，道武帝被殺。明元帝在鎮壓清河王政變後即位，他吸取道武帝末年的教訓，採納崔浩建議，以太子拓跋燾監國，平城政權從此進入太子監國時期。

本章首先考察北魏皇權初建時期的代表人物道武帝在什翼犍代國滅亡後至拓跋政權重建前的十年之內流亡中原的經歷，以利於理解道武帝此後致力於實行中原傳統體制的原因；其次考實道武帝推行離散諸部及其相關措施的過程和它們對於北魏皇權確立的重大意義；最後略述北魏皇權確立的過程和清河王政變的因果。至於明元帝即位以後的情況，雖也屬於本章所論時期，但與下章內容的關係更為密切，故歸入下章論述。

第一節 道武帝早年經歷考

作為北魏平城政權前身的代國，^①是自魏晉以來一直活動在陰山山脈以南大草原上的以拓跋部為核心的部落聯盟。它曾多次沿黃河東進到大同盆地，甚至南下到晉中一帶。在末代代王什翼犍建國三十九年（376年）之際，前秦大司馬苻洛率領二十萬軍隊大敗代王什翼犍部眾，然後將其所轄各部落分歸鐵弗部首領劉衛辰和獨孤部首領劉庫仁統轄，從而滅亡了代國。自此之後直到登國元年道武帝重建拓跋政權為止的十年裏，拓跋部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對於這分崩離析的十年，史書語焉不詳，它成了拓跋部歷史上的斷裂帶。

值得注意的是，在代國滅亡後的十年中，有一批代國王室成員在中原流落。他們當時的經歷並不為人注意，但是卻關係到拓跋政權的重建及其重建後的發展方向。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北魏的開國皇帝道武帝拓跋珪。本章第一節就考述道武帝及其他相關的代王室成員在代國滅亡後至拓跋政權重建前的這段經歷。

一、罪徙蜀地

道武帝於什翼犍建國三十四年（371年）七月七日生於參合陂北，為《魏書》中所謂的獻明帝拓跋寔的遺腹子。獻明帝是代王什翼犍之子，他死於道武帝出生的當年之春。^②什翼犍建國三十九年，拓跋氏代國為前秦所滅，部落敗散，年僅六歲的道武帝再遭不幸，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流離生活。

道武帝六歲以前的情況，《魏書》卷二《太祖紀》中有比較詳細的

^① 《魏書》卷一《序紀》載，拓跋部落首領猗盧於西晉永嘉四年（310年）被晉懷帝封為代公。拓跋部稱代始於此時。

^② 詳見《魏書》卷一《序紀》、卷二《太祖紀》。

記載，尤其是其出生的年、月、日及地點記得十分精確。但是，該書寫至道武帝六歲時，編撰者魏收卻忽然停筆，曰：

年六歲，昭成（什翼犍）崩。苻堅遣將內侮，將遷帝於長安，既而獲免。語在《燕鳳傳》。

在道武帝的生平事跡中，這一段生活是至關重要的，理應由其本紀敘述，但《太祖紀》卻將責任推卸給了《燕鳳傳》。

《燕鳳傳》收於《魏書》卷二四中，然而其中僅有燕鳳與苻堅的一段關於安置道武帝的對話，並無有關道武帝經歷的更多記載。現將這段對話抄錄於下：

及昭成崩，太祖（道武帝）將遷長安。鳳以太祖幼弱，固請於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沖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此禦邊之良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

《北史》卷二一《燕鳳傳》所載同於《魏書》。《資治通鑑》所載內容與此二書大略相同，而將此事繫於卷一〇四《晉紀》太元元年（376年）條下，此年即什翼犍建國三十九年，正是代國滅亡之年。《資治通鑑》確定此事繫年的依據可能是《魏書》的《序紀》和《太祖紀》。但根據《序紀》和《太祖紀》，什翼犍於代國滅亡之前已死在代北，而這段對話卻發生在代國初滅之後。《資治通鑑》似乎沒有覺察到其中的矛盾。

據《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上》載，前秦對代國戰爭的主帥是苻洛，苻堅當時仍在長安，並未親臨前線戰場。《魏書》卷一《序紀》

什翼犍建國三十九年條也稱：

苻堅遣其大司馬苻洛率眾二十萬及朱彤、張蚝、鄧羌等諸道來寇，侵逼南境。

這條記載與《苻堅載記上》是一致的。上引《燕鳳傳》的最後有「鳳尋東還」一句，也說明燕鳳當時已脫離拓跋部的部眾。這些都足以證明苻堅與燕鳳的談話地點是長安。那麼，作為當年代國舊臣的燕鳳，是早就投奔前秦了呢？還是代國敗亡後被俘往長安的呢？《燕鳳傳》沒有交代明白。

《燕鳳傳》稱：

昭成（什翼犍）與（燕鳳）語，大悅，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苻堅遣使牛恬朝貢，令（燕）鳳報之。……（燕）鳳還，（苻）堅厚加贈遺。^①

燕鳳是受代王什翼犍親近信任的大臣，他雖曾出使前秦，但完成使命後就返回代國了，行前還受到過苻堅的豐厚「贈遺」。而這條史料中的「鳳還，堅厚加贈遺」七個字恰好就接在上文從《燕鳳傳》中引出的苻堅與燕鳳討論如何安置道武帝的那段對話之前。由此看來，燕鳳不大可能在代國滅亡之前投奔到前秦長安去，他應該是在代國戰敗後作為亡國遺臣而被俘往長安的。只是由於他以前出使過前秦並受到過苻堅的厚待，因而再次到長安後便被另眼相看，所以就有了向苻堅進言的機會。

^① 《北史》卷二一《燕鳳傳》記載的內容與此相同。中華書局標點本，北京，1974年第1版。